

短論·觀察·隨筆

回到啟蒙： 李慎之思想的歷史脈絡

● 單世聯

在中共地下黨員的老師的引導下，中學時代的李慎之就學習了革命理論。到1940年中學畢業時，他已「醉心於馬列主義」。作為「進步青年」，李在經歷了1930年代的「新啟蒙」之後投身於革命。這場由共產黨人和左翼哲學家發動的「新啟蒙」始於1937年，它「以無產階級的新哲學、新思想不但『啟』傳統文化之『蒙』而且『啟』五四時代資產階級舊民主思想所加於人民之『蒙』」^①。大學期間，李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並於1946年到重慶參加《新華日報》的編輯工作，「新啟蒙」在他的心中扎了根^②：

隨着讀的書越來越多，馬列主義在我思想裏的地位也越來越崇高。例如有的書一上來就宣布「哲學是有黨性的，新哲學恥於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們的哲學就是與剝削階級的哲學對立的」，這種直率的氣魄一下就把我鎮住了。再讀下去，我知道了人類的歷史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生產力又決定生產關係。自從脫離原始共產主義以來，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要經過五個階段，而我們今天鬥爭的目的就是要消滅剝削階級，建立沒有戰爭、沒有壓迫、

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我們的鬥爭一定會勝利，因為這是規律，是科學，是對任何社會都適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這是最後的鬥爭。至於說「無產者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鏈，而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更是使我熱血沸騰。……新啟蒙運動的最後完成應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在1949年的勝利，在那以後，新啟蒙終於徹底否定了「五四」的「舊啟蒙」。

就在李慎之接受「新啟蒙」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老師陳獨秀卻已經由「新啟蒙」回到「五四」啟蒙。陳早年認為，只有一種民主理念，那就是法蘭西的人權、平等、自由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巴黎和會之後，在種種內外因素的刺激下，陳以其法蘭西式的激情迅速從「普遍人權」轉向平民主義，從「資產階級民主」轉向「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啟動了否定「五四」的「新啟蒙」。然而，在經歷了政治生涯中的飛揚翻滾（五任總書記、托派領袖、南京囚徒），特別是反思了斯大林主義之後，陳與時俱進，「二次覺悟」，重新審視了「資產階級民主」。他尖銳地指出，「民主」不僅僅是一個

抽象名詞，其真實內容包括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徵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內容大致相同，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所謂「無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只有保持資產階級的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蘇聯專政之弊，即賤視民主之過。陳寫道^③：

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得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得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便會用之殺自己。

陳獨秀特別強調，在封建傳統深厚的東方落後國家，更應把民主當作奮鬥目標，而不能把「專政」奉為神靈而把「民主」視為妖魔。因此不應該像有些人根本反對自由民主，痛罵民主自由是陳詞腐調，指摘主張民主自由的人是時代錯誤；或者客氣一點，拿中國特殊的所謂「民主自由」，來抵制世界各民主國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則。

陳獨秀晚年也不是自由主義者，但在民主與獨裁、在英美民主制與俄

德意法西斯制之間，他堅決地選擇了前者。從其1936年的〈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到1942年的絕筆〈被壓迫民族之前途〉，陳一再強調：如有人反對或鄙薄資本主義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這不是反對資產階級，而是幫助資產階級更兇橫地、更露骨地迫害無產階級。所以，「反對希特勒，便不應同時打倒希特勒的敵人，否則所謂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勝利，都是一句空話。」^④

當然，即便李慎之當時就看到陳獨秀的晚年見解，也不會放棄「新啟蒙」的信念。1940年代，他讀過蘇聯人葛誠科 (Victor Kravchenko) 的《我選擇自由》(*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 一書。書中揭露了蘇聯扼殺民主自由以及烏克蘭大饑荒的一些情況。作者原是蘇聯政府軍械局局長，1943年被派到華盛頓負責物資採購工作，次年叛逃，在美國避難，並出版了這本自傳。由於作者是美蘇合作期間第一個逃到西方的蘇共官員，在當時影響很大。1945年，此書經蘊雯、陸沉、安納三人翻譯，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印行，中國當局出版此書的目的是批判蘇聯極權主義專制獨裁統治。正沐浴在「新啟蒙」光芒中的李慎之當然視之為「造謠」，繼續在革命陣營中一路高歌(參見高放：〈我所了解的李慎之〉，載李普主編：《懷念李慎之》[李慎之生前友好捐資自費印製，2003]，頁94)。直到反覆經驗了「革命吃掉自己的女兒」的晚年，李才與老朋友高放談到此書，而此時他也在思想上返回到啟蒙：

前兩年讀了陳獨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論，我更是恍然大悟，根本沒有甚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不同，也沒有甚麼舊民主與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⑤

我們這些「進步青年」糊塗的地方就在於居然認為美式的民主與蘇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並行不悖的。……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才能與自由主義互動互補，今天西歐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這樣。建立在專政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是沒有可能與自由主義互動的。⑥

在晚年的李慎之看來，中國文化的傳統是專制主義，這一傳統不僅古已有之，而且於今為烈，要根本鏟除專制主義必須真正實行民主，所以中國必須走各國的必由之路，建立民主制度。他認為，當代中國對民主的認識有不少歪曲之論，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產階級民主對抗資產階級民主。應當說，這個問題已經由陳獨秀回答了。李重提陳獨秀，認為此論跟把市場經濟說成是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同出一轍。

民主作為一種普適權利，與每個人的出身、職業、立場、觀點、宗教信仰無關。不過，到二十世紀末，有關民主的論爭主要不是以階級劃線，而是以發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的差異來論證中國不同於西方的特殊性，並以此拒絕西式民主。這就形成一個奇特的對照：過去說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形式的、虛偽的，無產階級的民主才是實質的、真正的，而現在則說：因為中國落後於西方，所以不能選擇西方的民主制。比如把民主體制的建立與國民的民主意識的提高對立起來、用「穩定壓倒一切」來反對實行民主制度等等。

有鑒於此，李慎之晚年思想的重心，是強調民主的普適性。他認為「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今天已為全世界普遍接受，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世界經過工業化以來兩三百年的比較和選擇，中國尤其經過了一百多年來的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社會試驗，

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證明，自由和自由主義是最好、最具普遍性的價值。」⑦ 1991年，李率先在中國提出「全球化」這一概念，認為全球化有賴於全球價值的建立，而全球價值就是「自由」，他還挑明現代中國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傳統，強調主流文明與普世價值雖非中國幾千年文化中固有的傳統，但是來到中國就會生根發芽，與中國傳統融和。

事實上，這個問題同樣可以回到1940年代來審視。馬克思曾一再指出，資本主義發展的嚴重滯後是近代德國一系列悲劇的根本原因。當德國資產階級開始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英法等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掌握了國家政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已經日益明顯，並開始發展到公開對抗的地步。因此，德國的資產階級不能像英法資產階級那樣堅決地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而只有與德國的封建容克(Junker)貴族妥協與聯合，以共同對付工人階級的反抗。

在狼煙四起、法西斯主義暴行肆虐歐洲的黑暗年代，流亡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契(György Lukács)在追溯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的道路時認定，納粹浩劫這「最恥辱的一頁」，記錄的是整個德國近現代史，這就是在近代所有重大轉折關頭，德國人都對歷史向他們提出的問題作了錯誤的、非民主的回答。當偉大的歐洲人民在近代開始組成民族國家時，德意志走向純粹的封建割據；當歐洲資產階級開始其「英雄」的大革命時，德意志只能在哲學、文學領域進行「雲端中的戰鬥」；當一再推遲的民族統一終於在1871年完成時，依靠的卻是普魯士的刺刀。總之，從十六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走的是一條非自由民主的道路。即使在經濟發展已超過英法兩國

而位居歐洲第一的十九世紀末，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制度也沒有建立^⑧：

由於德國經濟與政治之間已經存在的這種充滿矛盾的關係並沒有妨礙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它在這裏恰恰很容易被理解為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魯士道路」，因此必然會產生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它在思想上為德國的這種經濟與政治之間的矛盾作辯護，認為它是比民主西方更高級的一個階段，具有更好的發展可能性。

所以，當十九世紀下半葉批判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成為西方的流行趨勢時，盧卡契基於德國的歷史經驗，堅持認為德國人沒有權利對民主進行放肆的嘲諷和批判：「因為在西方它們是對已經取得的現存資產階級民主感到失望的一種表達，而在德國它們則成為爭取民主的一個障礙，變成放棄為民主而進行堅決鬥爭的一種言行。」^⑨對於長期缺乏民主經驗和傳統、在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落後了整整一個歷史時代的德國來說，簡單地以民族傳統、德意志精神、普魯士道路來拒絕「西方」民主，只會加劇德國意識形態的非理性主義和政治反動，並帶來更大的災難。如果說德意志現代性最後是在集中營的焚屍爐中完成的，那麼德國伸張、捍衛其特殊性的努力所帶來的主要是教訓和警告。

和陳獨秀一樣，盧卡契也不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讚美者，不是「西方」現代性敘述的認同者，但在資產階級民主與法西斯野蠻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他們都強調，相對於獨裁政治和法西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是人類歷史上的更高階段，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只能在它的基礎上創造發展出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不能簡單地否定它。要言之，首先是民主

與獨裁之間的選擇，其次才是在不同民主形式（階級的、民族的）之間的選擇。這一觀點與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盧森堡（Rosa Luxemburg）、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Georgij V. Plekhanov）的有關論述相一致。如果陳獨秀主要破除的是民主的階級論，盧卡契則更重視民主在一定歷史階段的普適性。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被壓抑的傳統。從列寧到毛澤東，所持的都是階級論民主觀。在盧卡契、陳獨秀苦心孤詣地論述民主的連續性、普適性時，毛澤東正充滿熱情地宣講民主的「新」、「舊」之分：

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甚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⑩

中國也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企圖建立一個純粹民族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專政的國家，……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推翻外來的民族壓迫，廢止國內的封建主義的和法西斯主義的壓迫，並且主張在推翻和廢止這些之後不是建立一個舊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個聯合一切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制度。^⑪

「新民主」在成功配合了中國革命之後又成為當代中國的政治實踐，它也重複了斯大林主義的邏輯，實際上淪為個人獨裁。文革結束後，鄧小平、葉劍英等領導人都一致指出文革的法西斯性質；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更具體地把文革與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戰爭並列，指出其手法都是愚弄民眾、鼓吹狂熱、迷信崇拜等等。

與盧卡契反思德國納粹、陳獨秀反思斯大林主義相似，李慎之的民主論要反思和告別的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和文革浩劫。他們的觀點驚人地相似，但陳、盧的思想湮沒於隨後的冷戰狂潮，而李則擁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背景支持，所以他竭力主張實行政治改革，以自由、民主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政治目標。針對種種以國情特殊延滯政治改革的觀點，李提問：政治改革，俄國行、印度行，中國為甚麼不行？他明確指出：「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⑫這是毫無疑義的。在思想文化上，李主張重新回到「五四」啟蒙^⑬：

中國的傳統文化自從秦始皇稱帝一統天下的兩千二百年以來，一言以蔽之，就是專制主義。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八十年了，為了把德先生與賽先生請進中國來，也不知有多少人花了多少力氣，甚至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其艱苦與壯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見的。然而結果是五四先賢的初衷仍然沒有在中國達到。……我們只有屢敗屢戰，再接再厲，回到五四，重新啟蒙。

從「新啟蒙」回歸啟蒙，是1990年代以來若干在「新啟蒙」潮流中成長起來的「老同志」（一定程度上包括當年「新啟蒙」的理論家胡繩）的共識，這一重大思想現象說明了「五四」啟蒙沒有完成的基本事實。只是在啟蒙的理念受到世界範圍內的嚴格審視下，在中國文化面臨着現代與傳統之爭尚未解決、而中西之爭又更為突顯的形勢

下，我們恐怕很難再度擁有「五四」啟蒙者（如陳獨秀）的那種明朗熱情和樂觀自信了。

註釋

①② 李慎之：〈不能忘記的「新啟蒙」——《革命壓倒民主》的補充〉，載張貽輯：《李慎之文集》，上冊（北京：編者自印，2004），頁159；162-63。

③ 陳獨秀：〈給西流的信〉（1940年9月），載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555。

④ 陳獨秀：〈給西流等的信〉（1940年3月2日），載《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頁541。

⑤ 李慎之：〈回歸「五四」學習民主——給舒蕪談魯迅、胡適和啟蒙的信〉，《書屋》，2001年第5期，頁18。

⑥ 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載《李慎之文集》，上冊，頁157。

⑦ 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序〉，載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0），頁246。

⑧⑨ 盧卡奇（György Lukács）著，王玖興等譯：《理性的毀滅——非理性主義的道路：從謝林到希特勒》（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頁51；56。

⑩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1940年2月2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732-33。

⑪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1055-56。

⑫ 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載《李慎之文集》，上冊，頁8。

⑬ 李慎之：〈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載李慎之、何家棟：《中國的道路》，頁268、269、272。